

曹植拟乐府的创作模式及其诗歌史意义

——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之六

吴大顺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 曹植拟乐府存在“拟调”和“拟篇”两种方式。他在“拟篇”中大胆创新,突破乐府诗的音乐限制,突出乐府诗的文本特征和文人情结,为文人徒诗在立意、谋篇和抒情言志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经验和范式,进一步巩固了“建安风骨”的文坛地位,从而完成了中国诗歌从“应歌”到“作诗”的转移,还创建了文人拟乐府的基本模式,为西晋傅玄、陆机等文人拟乐府提供了参照。曹植“拟乐府”的创新,又是以建安时期诗歌的文本传播和文人结集之风的兴起为背景的,“建安风骨”发生、发展、形成及其在文坛确认的历史进程刚好处于中国文化传播媒介由简帛为主向纸张为主的大转变时期,纸张书写的兴起,为文学传播提供了媒介基础,有效刺激了诗歌的文本传播和文人结集之风。

关键词: 曹植; 拟乐府; 模式; 文本传播; 范式

中图分类号: I207.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7)05-0166-05

随着建安七子的相继离世,邺中文人诗酒唱和的文学活动场被打破,加之曹丕称帝后对曹植等曹氏诸王的政治排挤和迫害,建安文学的政治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曹植的诗歌创作,较邺中时期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在题材上开始由游宴、赠答、送别等社交性内容向抒发个体人生遭遇和政治苦闷转向;二是在诗歌体式上多采用乐府体;三是在诗歌结构上增加了抒情的比重;四是在创作技巧上更注重比兴和辞华。这些创新,使曹植诗歌在情感上做到了济世之情与个人私情的交融,在艺术上做到了风骨与文采的结合,所谓“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1],从而完成了中国诗歌创作由“应歌”向“作诗”的转变,推动了诗歌文学的自觉。中国诗歌在曹植时代完成这个转变,除曹植这位天才诗人的大胆创新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外,此期文学传播媒介的变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重点探讨曹植拟乐府的创作模式,以及曹植拟乐府的新变与建安文学传播媒介变革的关系。

一、黄初、太和时期曹植诗歌体式述略

据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曹植黄初时期的诗歌有:

《杂诗》“高树多悲风”、《磐石篇》《仙人篇》《游仙》《升天行》二首、《责躬诗》《应诏》《七步诗》《赠白马王彪》《浮萍篇》《七哀》《种葛篇》《苦思行》《矫志》《鞞舞歌》五首等20余首。

太和时期的诗歌有:《怨歌行》《惟汉行》《当墙欲高行》《喜雨》《杂诗》“仆夫早严驾”、《鰕鮓篇》《吁嗟篇》《美女篇》《杂诗》“南国有佳人”“转蓬离本根”、《飞龙篇》《桂之树行》《平陵东》《五游咏》《远游篇》《驱车篇》《白马篇》《豫章行》二首、《丹霞蔽日行》《当欲游南山行》《当事君行》《薤露行》《箜篌引》《当车以驾行》《当来日大难》《妾薄命》二首、《名都篇》《元会》《门有万里客》等30余首。

黄初、太和时期,曹植大量使用乐府体创作。黄初20首诗歌中有乐府诗12首,太和31首诗歌中有乐府诗26首,共有乐府诗38首,占此期全部诗歌的75%。其中,相和歌辞有:相和六引《箜篌引》,相和曲《薤露行》《惟汉行》《平陵东》,平调曲《鰕鮓篇》,清调曲《吁嗟篇》《豫章行》二首、《浮萍篇》,瑟调曲《当来日大难》《丹霞蔽日行》《门有万里客》,楚调曲《怨歌行》等13首;杂曲歌辞有:《桂之树行》《当墙欲高行》《当欲游南山行》《当事君行》《当车以驾行》《妾薄命》二首、《名都篇》《美女篇》《白马篇》《苦思行》《升天行》二首、《五游咏》《远游篇》《仙人篇》《飞

收稿日期:2017-03-13;修回日期:2017-08-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学史研究”(15XZW016)

作者简介:吴大顺(1968-),男,苗族,湖南保靖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传播学

龙篇》《磐石篇》《驱车篇》《种葛篇》等 20 首；鞞舞歌辞有：《圣皇篇》《灵芝篇》《大魏篇》《精微篇》《孟冬篇》等 5 首。

曹植还是建安诗人中大量使用五言创作的诗人。现存 41 首乐府诗中有 30 首五言，其中相和三调乐府 13 首，拟杂曲乐府 13 首，《鞞舞歌》4 首。另外，曹植现存 36 首文人徒诗，除《元会》《责躬》《应诏》《朔风》《矫志》《闺情》等 6 首四言、《离友》2 首骚体外，其余 28 首全为五言。五言诗体占曹植全部诗歌的 75%^①。建安是“五言腾踊”的时代，建安诗人普遍采用五言进行诗歌创作，曹植最为突出。

二、拟调与拟篇：曹植拟乐府的两种方式

汉魏拟乐府存在拟调和拟篇两种基本方式，曹植作为建安时期拟乐府最多的诗人，他对拟调、拟篇两种方式都有采用。总体而言，其相和三调歌辞多拟调，而杂曲歌辞则多拟篇。

（一）拟调与拟篇的双重观照：曹植相和三调歌辞的创作模式

曹植作为一名喜爱并精通音乐的文人，他的很多乐府诗是拟调而成的。如《平陵东》“阖闾开”：

阖闾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

《平陵东》古辞：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二者句式结构大体一致，当是典型的拟调之作。

又如《薤露行》“天地”：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曹操《薤露行》：

惟汉二十二世，所在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乐府解题》曰：“曹植拟《薤露行》为《天地》。”^{[2]397}内容上，曹操作品从汉代建国历史开始，

重点叙述汉末国乱的史实，表达其对汉王朝的“黍离之悲”。曹植作品开篇依循《薤露行》曲调的挽歌性质和悲叹“人命奄忽”的传统主题，叙写人生短暂之悲，接着诗歌拓展出以王佐之才“输力明君”、以“径寸”之翰“流藻华芬”的愿望。《薤露》古辞，《宋书·乐志》失载，《乐府诗集》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曹操、曹植的拟作在结构上完全一致，而与《乐府诗集》所载不同，二者依拟的可能是曹魏时期传唱的《薤露行》曲调。曹植另有一首《惟汉行》，则是拟曹操《薤露行》“惟汉篇”的作品，属于拟篇之作。《乐府诗集》曰：“魏武帝《薤露行》曰：‘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曹植又作《惟汉行》。”^{[2]396}总体而言，曹植拟相和歌及清商三调的作品，在句式结构上与原作和同期其他拟作基本相似，这一特点是拟作遵循原曲音乐要求的结果，属于拟调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曹植的作品除了句式结构上与原作保持一致外，在题材、主题和抒情方式上也与原作保持一定的内在联系：或从原作主题中引申，或从原作的某个点宕开拓展，体现了文人拟乐府的新创。在情感表达上，曹植诗歌也以抒发个体情感为主，但与曹操、曹丕不同的是，他往往以史事和寓言式的故事影射现实、传达比兴寄托，显得含蓄曲折。在结构上，曹植诗歌也多以史事或虚构的寓言故事展开，而且这些史事或寓言仅仅作为诗歌主题的说明，不求故事的完整性。这种结构方式大大减弱了诗歌的故事性，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性。如曹植《吁嗟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惊飏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飘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麋灭岂不痛，愿与根芟连。

《乐府解题》曰：“曹植拟《苦寒行》为《吁嗟》。”^{[2]499}可见，《吁嗟篇》是曹植拟曹操《苦寒行》“北上篇”的作品。在句式结构上，曹植《吁嗟篇》与曹操《苦寒行》完全一致，但在主题上，《吁嗟篇》不依拟《苦寒行》“冰雪溪谷之苦”^{[2]496}，而是叙写转蓬“长去本根逝”“流转无恒处”的飘零之悲，表达转蓬“愿与根芟连”的愿望，在曹操《北上篇》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升华。诗歌虽然以第三人称展开叙述，但“转蓬”故事是作者虚构的，具有明显的比兴寄托意义。在抒情方式上，诗歌以转蓬为喻，通过转蓬“愿与根芟连”的愿望，表达作者对自己“十一年中而三

徙都”的转蓬式命运的感伤,感情虽然慷慨悲苦,但用寓言方式表达,显得委婉含蓄。又如《怨歌行》“为君”: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开金滕,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吾欲尽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诗歌开篇发出“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的感慨,接着以周公旦推心辅佐王室,而管叔、蔡叔以流言反之的史事予以说明,诗中的史事篇幅虽然很大,但仅是诗歌观点的“论据”,不是诗歌的主体,而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又使诗歌与汉乐府传统保持一定联系。

可见,曹植的相和三调乐府诗创作是在原曲音乐风格和歌词内容的二维参照中进行的,作品既考虑了曲调的音乐要求,也充分注意了曲调反映的传统内容和主题,体现了拟调与拟篇的双重性质。

(二) 拟篇:曹植杂曲歌辞的创作模式

曹植的杂曲歌辞在其乐府诗中独具特色,是典型的“拟篇”之作。《乐府诗集》共收曹植杂曲乐府 21 篇^②,内容涉及游仙者最多,有《升天行》《仙人篇》《游仙》《远游篇》《飞龙篇》《驱车篇》等 10 余篇,其他涉及游侠如《白马篇》、履险如《盘石篇》、美女如《美女篇》、弃妇如《种葛篇》、宴娱如《名都篇》等,题材十分广泛。据《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解题,杂曲有几种情况:一是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二是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者;三是因意命题,学古叙事者^{[2](885)}。杂曲歌辞或存古辞、或存拟辞、或学古自作的三种情况,说明这些曲调基本不歌、不传了,曹植的杂曲乐府多是以古辞或拟古辞的文本为依据的“拟篇”之作,其中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的作品,当是根据曹植对乐府诗传统和艺术精神的理解而进行的独创。相比相和三调乐府而言,曹植的杂曲乐府更加强调诗歌的文本意义,文人化特征更为鲜明。

第一,在情感表达上,往往通过神话故事、美女弃妇,或他事他物的比喻和象征,表达诗人的个体情感体验。这些诗歌的情感虽然多从诗人个体角度而发,但又总是将触发情感的真实原因隐藏在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使诗人个体的特殊情感通过人们所能感受到的人物或场景的比喻象征意义表达出来。如《美女篇》借一位妖闲皓素的美女成年处房室而不得所配的叹息,表达诗人为君猜忌而不得任用的痛苦;《盘石篇》

借“盘石”的身世和遭遇表达诗人“身本盘石而迹类飘蓬”的痛苦;《飞龙篇》借乘龙升天、求仙问道来表达诗人急欲摆脱现实的超世之情。

第二,在诗歌结构上,往往通过故事来结构全篇,在叙事中抒情。如《白马篇》塑造了一位为国赴难、视死如归的“游侠”形象,诗歌以赋笔展开描写,上半叙述游侠的着装、出身,接着铺陈游侠高超的射技;下半叙述国家有难,游侠挺身而出,不顾性命和私情;最后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结束,总结游侠高尚的品质。全篇从头至尾都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叙述游侠的故事。最后两句在对游侠故事的概括和总结中表达诗人对游侠高尚品质的赞美。《美女篇》全诗 30 句,前 22 句都是叙事。开篇写女子采桑歧路,接着写女子的穿着打扮和高洁的气质,并以行徒和休者的反应作映衬,再写女子青楼高门的家世和门第。最后 8 句抒发“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的感慨。全诗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叙事,美女采桑情节及外貌描写明显是模仿汉乐府《艳歌罗敷行》而来,后半的感慨抒情,也从美女角度着眼。《飞龙篇》则以乘龙升天为线索展开叙事,先写晨游太山、忽逢二童、长跪问道,后写西登玉堂、授我仙药、教我服食,最后表达“寿同金石,永世难老”的愿望,构成诗歌以叙事为主的结构模式。比较而言,曹植相和三调乐府诗往往弱化叙事成分而突出抒情色彩,而杂曲乐府则有意强化叙事成分,并多从第三人称视角叙事,体现了诗人对汉乐府传统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在诗题命名上,多以“篇”为题,还出现了“当××行”的方式。曹植相和三调乐府中,《吁嗟篇》《鰕蛄篇》《浮萍篇》3 篇是以诗歌首句的头二字为篇名的,杂曲乐府中,这种篇名方式明显增多。现存杂曲乐府 20 篇,以“篇”命名的有《仙人篇》《白马篇》《名都篇》《美女篇》《远游篇》《种葛篇》《飞龙篇》《盘石篇》《驱车篇》等 9 篇。《乐府诗集》引《歌录》曰:“《名都》《美女》《白马》,并《齐瑟行》也。曹植《名都篇》曰‘名都多妖女’,《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闲’,《白马篇》曰‘白马饰金羁’,皆以首句名篇。”^{[2](911)}“以首句名篇”强调的是“篇”的意义,而非“曲”的意义,乐府诗命名方式由“行”向“篇”的过渡,标志着乐府诗的文本意义逐渐受到诗人的重视,也体现了曹植乐府诗创作的“拟篇”性质。

另外,在曹植杂曲乐府中还出现了“当××行”的诗题,如曹植杂曲乐府《当来日大难》《当墙欲高行》《当欲游南山行》《当事君行》《当车已驾行》等。《说文解字》曰:“当,田相值也。值者持也,田与田相持也。引申之,凡相持相抵皆曰当。”^[3]后引申为“顶

替”“代替”。曹植杂曲乐府“当×行”的“当”就是“代替”的意思，是魏晋拟乐府的标志。《乐府解题》曰：“曹植拟《善哉行》为‘日苦短’。”^{[2](540)}“日苦短”是曹植《当来日大难》的首句。朱乾《乐府正义》曰：“当，代也，以此代《来日大难》也。”^{[4](147)}又黄节《当墙欲高行》解题曰：“郭茂倩《乐府》墙欲高行无古辞，盖已佚，以子建此篇之当字，知必有古辞也。”^{[4](153)}陆机有《当置酒》1篇，是拟曹植《野田黄雀行》“置酒”篇而成的作品。《乐府解题》曰：“晋乐奏东阿王‘置酒高殿上’，始言丰膳乐饮，盛宾主之献酬，中言欢极而悲，嗟盛时不再，终言归于知命而无忧也。”^{[2](570)}陆机《当置酒》首句“置酒宴嘉宾”来自曹植“置酒”篇。后来鲍照的乐府诗往往用“代×行”。曹植杂曲乐府“当×行”标题，说明诗人已经有意识地拟作乐府古辞，标志文人拟乐府的创作意识开始形成了。

如果说曹植相和三调乐府是在音乐曲调和歌辞文本的二维参照中进行的，具有拟调和拟篇的双重性质，那么其杂曲乐府则更多地体现了曹植对歌辞文本意义的重视。曹植能在杂曲乐府中创新，是因为他所拟的这些杂曲歌辞基本上都是以文本传播的，其因意命题、学古叙事的一些作品其实就是自己的独创，没有依拟对象，但凭作者对汉乐府歌辞的认识和理解，确立主题，安排结构，选择表达方式。

三、建安文学传播媒介变革与曹植乐府诗的文学史意义

汉末建安时期，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和工艺的改进，纸张被大量用于书写领域。日常往来书信、书法作品、朝廷文书、诗文作品以及经传图书均开始使用纸张书写，传播媒介进入简、帛、纸并用时代。纸张书写的普及，为文学文本传播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技术条件，带动了诗歌文本传播由简向纸的过渡，建安诗歌传抄和文人结集之风开始兴起。

建安时期的曹魏政权十分重视典籍整理和诗文结集。曹操时代，就十分重视对图书典籍的收集工作。《三国志·袁涣传》载，魏国初建时，袁涣向曹操建言，“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深得曹操赞许。建安三年，曹操破吕布时，曾“给众官车各数乘，使取布军中物，唯其所欲。众人皆重载，唯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5](334-335)}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曹操破袁绍，“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5](21)}。曹操还曾向蔡琰征集家藏坟籍。《后汉书·烈女传》载：“操

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有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6]

魏文帝黄初时期，设立秘书监，专门负责图书典籍的收集和整理。《晋书·职官志》载：“汉桓帝延熹二年置秘书监，后省。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丞。及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7](735)}《初学记》卷十二，秘书监条曰：“魏文帝黄初初，分秘书立中书，中书自置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别掌文籍焉。……及王肃为监，以为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之职，安可复属少府，自此不复焉。”^[8]

曹魏政权收集的图书文籍，皆藏于秘书监藏书阁，秘书监中有秘书丞、秘书郎等属官负责图书文籍的整理、校勘和编撰。曹魏时期在图书典籍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大的两件事，一是魏文帝组织众多文人编撰大型类书《皇览》^{[5](65)}；二是魏明帝时期，秘书郎郑默对曹魏秘书中外三阁的藏书进行“考覆旧文，删省浮秽”^{[7](1251)}的整理，并按甲乙丙丁四部，编撰《中经》十四卷^[9]，此不赘述。

在此背景下，建安时期的文集编撰也开始盛行起来。曹丕是建安时期文集编撰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曾亲自编订自己的文集。其《与王朗书》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余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不倦。”^{[5](88)}此信首先强调“著篇籍”对于人生“不朽”的重要意义，然后回顾自己将“所著《典论》、诗赋百余篇”结集之事，即如《本纪》所云：“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5](88)}此外，他还编订过建安七子的文集。其《又与吴质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5](608)}“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就是将建安七子的遗文合编成一集，此有后来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及序为证。曹植也曾自编过自己的文集。其《前录自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

撰,为前录七十八篇。”^[10]曹植死后,魏明帝曾下诏“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5](576)}。其他文人作品的结集情况亦有载籍,如《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5](1254)}《三国志·王昶传》注引《别传》任昭先传曰:“文帝时,为黄门侍郎……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昶卒后,故吏东郡程威、赵国刘固、河东上官崇等,录其事行及所著书奏之。诏下秘书,以贯群言。”^{[5](555)}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说:“自东京以降,迄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11]

曹植乐府诗创作是在上述传播媒介变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从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太子至建安二十五年代汉称帝,曹植身处曹丕、曹睿父子猜忌、排挤和严酷迫害的环境之中,其乐府诗被乐官采集、配乐演奏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事实上,曹植现存40篇乐府诗,有配乐记录者仅《野田黄雀行》“置酒”篇(《箜篌引》亦用此曲)、《怨歌行》“为君”篇、《鼙舞歌》5篇及《怨诗行》“明月照高楼”等8篇^①。刘勰说:“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12]建安时期,由于文学媒介的纸本化变革和文人对文本文学的日益认可,曹植便有意识地突破乐府诗的音乐限制,突出乐府诗的文本化特征和文人文化情结,在情感表达、诗歌结构和命题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曹植在乐府诗创作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为当时文人徒诗创作在立意、谋篇和抒情言志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经验和创作范式,进一步巩

固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和创作范式在文坛的地位,完成了中国诗歌从“应歌”到“作诗”的转移,也为西晋傅玄、陆机等文人拟乐府提供了参照,创建了文人拟乐府的基本模式。曹植乐府诗的文学史意义正在于此。

注释:

- ① 关于曹植现存诗歌的数量问题,存在一些争议: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收诗77首,另收非曹植所撰而旧集误收者3首;黄节《曹子建诗注》收诗70首。今据《曹植集校注》,定为77首。
- ② 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曹植《斗鸡》亦收录为杂曲歌辞。
- ③ 曹植《明月》篇,《曹植集》《文选》皆作《七哀诗》,《玉台新咏》作“杂诗”,《宋书·乐志》作《楚调怨诗》“明月”,《乐府诗集》作《怨诗行》,当是乐工选诗配乐所至,与拟乐府性质不同。

参考文献:

- [1] 曹旭. 诗品笺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6.
- [2]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97.
- [4] 黄节. 曹子建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5]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801.
- [7]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 徐坚. 初学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4:294.
- [9]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906.
- [10] 赵幼文. 曹植集校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34.
- [11] 章学诚. 文史通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96.
- [12]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03.

The creation and propagation modes of imitation of Yue Fu from Cao Zhi

WU Dash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odes in Cao Zhi's imitation of Yue Fu: imitation of music and imitation of article. He intentionally breaks through the music limitation of Yue Fu poetry, boldly innovates in the imitation of article, emphasizes the papery characteristics and literati complex of Yue Fu poetry, and provides creation templates on concept, plan, and expression for literati. All of those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ole of vigorous style of Jian An,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or Chinese poems from being in response to song to create poems. The innovations of imitation of Yue Fu by Cao Zhi is dependent on the papery propagation of poems at Jian An period and the rise of literati gathering habi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for vigorous style of Jian An from birth, development, maturity on literature conforms with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Chinese culture propagation main media from bamboos slip to paper. The emergence of paper provides media basis for literature propagation, and spurs the papery propagation of poems at Jian An period and literati gathering habit.

Key Words: Cao Zhi; imitation of Yue Fu; model; papery propagation; template

[编辑:何彩章]